

·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

我国农民的职业流动及择业期望

林 坚, 葛晓巍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9)

[摘 要] 通过代内流动表对农民初职、现职和未来职业预期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今后我国农民非农化进程将减慢;最期望流向其他职业的是雇工而不是农民;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农民向高层流动的“中转”职业;尽管农民的流动人数很多,但都集中在声望值较低的职业之间,流动后的社会地位依然不高。如何加快农民继续向非农职业转移以及促进农民由低层向高层流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转变农民身份的一系列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已弱化,使农民具备向上垂直流动的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农民; 非农化; 职业流动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7)02 - 0110 - 08

Chinese Farmers' Occupation Change and Expectations in Career Choice

LIN Jian, GE Xiao-wei

(The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critical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depend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social statu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status of farmers into the status of urban residents, only a few farmers have changed themselves into urban residen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finition of residential right or hukou.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have only changed their farming occupation into non-farming ones. Using the intra-generation mobility tab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farmers' earlier jobs, present jobs and future career expectations, especially their non-farming transforming process and tendenc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lot of farmers have changed their occupation from their earlier ones, but only a few of them have achieved their career expectations. Therefore, the non-farming transforming process will slow down in the future. Working experience in the non-farming sectors has broadened farmers' views and induced their desires to move to more decent jobs with their own capacities. It is the employed workers and not the farmers who have the highest career expectations and hence

[收稿日期] 200612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资助项目(05JJD810004)

[作者简介] 1. 林坚(1951),男,上海人,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面的研究; 2. 葛晓巍(1974),男,河北滦县人,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more likely to take other jobs. Self-employed workers are a link between low-tier and high-tier occupations. When the occupation mobility route is gradually shortened, middle-tier occupation will work as a deck for farmers to move toward to high-tier occupations. Although a lot of farmers have job mobility, most of them are engaged in low-level occupations and don't have high social status.

It's a long way for farmers to leave the rural areas and get decent occupations in the urban areas. Therefore, accelerating farmer's shift to non-farming jobs and promoting their mobility from low-tier occupations to high-tier ones are urgent issues. Although some policies aiming at changing farmers' status—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example—have successfully freed farmers from the farming land and let them have low-tier non-farming jobs, the role of these policies have gradually been weakened. While expanding farmers' chances of employment in the non-farming sectors, it is worth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armers' capabilities in having better employment.

Key words: farmer; non-farming; occupation mobility

一、引言

我国农民身份的改变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转变,这三者是我国农民非农化过程中三个既相对分离又依次递进的环节^[1]。农村中大部分劳动力仅仅是完成了职业的转移和地域的迁移(更多的是候鸟状迁移)这两个过程,只有少数劳动力真正转变了其身份,成为了市民。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实质性推进,取决于农民社会身份的真正转变。了解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流动情况及农民对职业选择的预期,对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有重大意义。

研究我国农民职业流动的文献大多结合劳动力的流动,集中于运用经典理论如“二元”经济理论^[2]、预期收入理论^[3-4]、相对地位假说理论^[5]、托达罗模型^[6]、推拉理论^[7]等研究农民在农业与非农职业间选择的原因、结果及影响因素,较少涉及农民进入非农领域后流动及生活的情况。有学者从代际、代内流动的角度研究全国各职业的转换及流动后职业声望的升降^[8]^[341-403],其中虽然涉及到农民从事非农职业人员的流动,但并不是其研究的重点。李强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研究了农民的职业流动,但只是比较了三个时点间(初职、二职和最后职业)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结构的变化,而未能研究农民非农职业选择过程中从业人员的流向^[9]。

对职业流动的研究通常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两个方面。国外比较重视代际流动分析,因为代际流动能凸显出社会结构因素对流动的长期影响。而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分类和社会流动机制在最近五十年里变化非常大,并且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代内流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借鉴前人使用的代内流动表的研究方法,从农民初职的选择、从事的现职和未来职业期望三个方面出发,对农民从事职业的变化以及选择理想职业的状况进行分析。

文中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近期对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四川 5 省 40 个村的一次关于“农民阶层分化及市民化”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 14 岁时居住在农村者,调查共收回问卷 1 340 份,有效问卷 1 222 份。

二、农民职业的流动

(一) 职业声望排序

为衡量农民在选择职业过程中地位的升降,我们先对各职业类型赋以声望值然后排序。职业的声望值依据李春玲所著《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8][178]}中农村人员对各职业声望的评价表所赋以。因调查所设职业选项为职业大类,与评价表中的职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评价表中寻找到相似职业,并以这种职业的声望值作为调查中职业的声望值。具体职业类别和声望值见表 1:

表 1 职业类别和声望值

职业编号及名称	参考职业	声望值
1 雇工	三轮车夫	20.83
2 农民	种田农民	25.80
3 农民工	农民工	28.51
4 个体工商劳动者	个体小商店店主	42.74
5 农村管理者	村委会主任	51.13
6 农村智力劳动者	小学教师	58.40
7 乡镇企业管理者	企业技术员	63.64
8 私营企业主	私营企业老板	65.66
9 其他	——	——

注: 雇工:指临时工; 农民工:指长期打工者; 农村管理者:指村干部、生产组干部等; 农村智力劳动者:指老师、医生、乡村技术员等; 乡镇企业管理者:指企业领导人、专业技术人员等; 其他:指工人、远洋钓鱼等选项中没有的职业。因调查中“其他”选项包含的职业类别差距悬殊,没有赋以声望值进而不能判断流动的升降。所以,在分析相关内容时忽略了“其他”选项。不过,选择“其他”选项的人数较少,不会影响分析的整体结果。

(二) 职业流动概述

表 2 表明的是农民从初职到现职的流动情况。表的列表示现在从事各职业的人员中有多少人来源于其他行业,表的行表示由初始职业向现在所从事职业转变的情况。表格对角线的数值表示没有改变职业的样本数,对角线以上的数值为职业声望上升的样本数,对角线以下的数值为职业声望下降的样本数。

雇工在所分析的 8 个职业中是声望最低的一个职业,从初职到现职的流动看,有 53 人流出从事他业,其中流出到农民和个体工商劳动者的比例较大,分别占初职雇工总人数的 12.00% 和 16.00%。流入雇工的人员主要为农民,共 60 人,占现职雇工总人数的 40.82%。尽管农民向雇工流动从职业声望上来说说是下降了,但从非农职业选择的角度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对于农民来说,流出人数为 300 人,占总人数的 48.70%,主要流出到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民工和雇工,分别占初职农民总人数的 17.53%、11.04% 和 9.74%。而流入到农民的人员并不多,仅为 62 人,约一半左右来源于雇工和农民工等职业。农民工除了一部分回流到农民外(13.76%),还有一部分(16.51%)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个体工商劳动者。而流入到农民工的人员主要为农民,68 人,占现职农民工总人数的 45.33%。对于个体工商劳动者来说,流出的人数并不多,72.88% 的人没有改变职业。流入的 162 人使这个职业的人数大为增加,主要来源为雇工(20 人)、农民(108 人)、农民工(18 人),分别占个体工商劳动者总人数的 8.06%、43.55%、7.26%。从事农村管理者和农村智力劳动者的人数较少。原来从事农村管理者的 13 人中,有 4 人重新回到了农民行列,其他 9

人分别从事了农民工、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村智力劳动者、乡镇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等职业。而流入到农村管理者的人员中,占较大比例的是农民,23人占农村管理者总人数的42.59%。对于农村智力劳动者来说,其人数变化最小,没有改变职业的人员比例也最大(78.75%),有13人从农民流入到农村智力劳动者中,占农村智力劳动者总人数的16.05%。

乡镇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是本文中声望最高的两个职业。乡镇企业管理者中,有12人流出,其中4人成为了个体工商劳动者。而流入到此职业的人员为15人,5人来源于雇工。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在初职从事此职业的4人中,有3人依然从事此职业,1人成为了农民工。而流入此职业的人数为26人,其中农民12人(占私营企业主总人数的41.38%),雇工和农民工各4人(占私营企业主总人数的13.79%)。

表2 初职到现职的流动

初职 \ 现职										总计
	1	2	3	4	5	6	7	8	9	
1	72	15	4	20	1	1	5	4	3	125
2	60	316	68	108	23	13	4	12	12	616
3	4	15	61	18	3	0	2	4	2	109
4	5	5	9	86	4	2	3	2	2	118
5	0	4	2	3	13	1	1	1	1	26
6	1	7	1	4	2	63	0	2	0	80
7	0	2	1	4	3	1	17	1	0	29
8	0	0	1	0	0	0	0	3	0	4
9	5	14	3	5	5	0	0	0	17	49
总计	147	378	150	248	54	81	32	29	37	1156

总体而言,在由初职到现职流动的过程中,322人职业声望上升,631人没有改变职业,134人职业声望下降(没有包括“其他”项)。从所占百分比来看,流入最多的职业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劳动者。这是因为与农村管理者和农村智力劳动者相比较,从事个体工商劳动者或私营企业主所要求的条件要低一些,大企业主固然需要较强的管理能力,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只要有一部分资金投入就可以了,而农村管理者和智力劳动者则要有较高的声望和教育的前期投入,因此,经过外出打工形成一定的资本积累后,农民很自然地成为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农村管理者流出人数所占比例最大,其流出可能是因为任职期满,并大多流向农民行列。流出最小的是农村智力劳动者,这是因为从事农村智力劳动者的人员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或者是家庭传递的,或者是通过付出很大的努力和投入而获得的,所以人们一旦从事了这类工作,就难以下决心改变。

三、农民的择业期望

对农民由初职到现职流动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到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那么,未来农民从事的职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通过问卷中“如果给您一个机会选择,您会选择从事哪一职业”这一问题的调查,我们可以考察农民未来职业选择的概况。

(一) 未来择业期望

从整体上看(见表3),有348人不想改变职业,749人期望从事的职业声望高于现职声望,73

以下各表中的总计数据与有效样本数1222不同,乃因数据缺失所致。

人期望从事的职业声望下降(没有包括“其他”项)。

雇工、农民和农民工是农民最不期望从事的职业,92.05%的雇工和90.68%的农民工都期望改变自己的职业。其中雇工流出139人,期望流向个体工商户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人数最多,分别为35人和36人,占雇工总人数的23.18%和23.84%,而流入雇工的16人全都来源于农民,占期望从事雇工总人数的53.33%。农民工中有35人(21.74%)和69人(42.86%)期望从事个体工商户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等职业,而期望流入到农民工的人员主要为农民,32人占期望从事农民工人数的50%。农民共流出了297人,其中期望流向私营企业主的最多,84人占农民总人数的20.34%,其次是个体工商户劳动者(53人占农民总人数的12.83%)和农村智力劳动者(48人占农民总人数的11.62%),而想成为农民的人数并不多,原来从事农业的116人占期望从事农业人数的81.69%。

个体工商户劳动者从业人数变化虽然不大,但流入流出人员较多,其中期望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有68人(占个体工商户劳动者的26.88%),而期望成为农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的人数均为24人(占个体工商户劳动者的9.49%)。期望成为个体工商户劳动者的人员中,21.37%来源于农民,各有14.11%来源于雇工和农民工。农村管理者中仅有18人不想改变职业,有14人期望成为私营企业主,占农村管理者总人数的25.45%,还有一部分人期望成为个体工商户劳动者、农村智力劳动者、乡镇企业管理者,分别占10.91%、14.55%和10.91%。从流入的角度看,期望成为农村管理者的人员主要为农民40人、个体工商户劳动者24人和农民工16人,分别占期望或为农村管理者总人数的32.79%、19.67%和13.11%。农村智力劳动者中,有12人(14.63%)期望成为私营企业主,8人(9.76%)和7人(8.45%)期望成为个体工商户劳动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期望成为农村智力劳动者的人中,30.19%(48人)为农民。36名乡镇企业管理者中,有11人(30.56%)期望成为私营企业主。而其他各职业都有人员期望成为乡镇企业管理者,因此,流入人数较多,占乡镇企业管理者的87.96%,其中来源于个体工商户劳动者的人数为24人,占期望从事乡镇企业管理者总人数的22.22%,来源于雇工和农民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7.59%和20.37%。私营企业主中有25人不想改变职业,占83.33%,而流入私营企业主的人员最多,占期望从事此职业总人数的92.49%,其中农民84人占总人数的25.23%,农民工(69人)和个体工商户劳动者(68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0.72%和20.42%,来源于雇工的人数占10.81%。

表3 农民的择业期望

期望 现职	1	2	3	4	5	6	7	8	9	总计
1	12	8	10	35	11	19	19	36	1	151
2	16	116	32	53	40	48	22	84	2	413
3	0	4	15	35	16	9	9	69	4	161
4	2	8	5	100	24	20	24	68	2	253
5	0	2	1	6	18	8	6	14	0	55
6	0	0	0	8	4	49	7	12	2	82
7	0	0	1	5	4	2	13	11	0	36
8	0	0	0	0	0	2	3	25	0	30
9	0	4	0	6	5	2	5	14	3	39
总计	30	142	64	248	122	159	108	333	14	1 220

这种由低层职业向高层职业的流动正是我们所期望的,但这仅仅是农民对未来职业的美好憧憬。下文以选择理想职业的原因为基础,对农民未来职业选择的情况进行调整,以观察未来职业选择的变化。

(二) 选择理想职业的理由

在选择期望职业的理由中(见表 4),以收入普遍较高、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别的选择三项所占比例较大,其中“收入普遍较高”的比例最大(514 人,占总人数的 42.10%),并集中于选择个体工商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排在第二位(316 人,占总人数的 25.88%),选择的职业集中于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管理者。而选择理由为“没有别的选择”中,都为职业声望较低的职业,其中农民最多,其次为农民工。

有一个好的期望并不一定就能实现,收入高、社会地位高和声望高作为选择期望职业的理由均为个人憧憬,并不是根据自身具体状况进行客观的选择。而“个人具有这方面的能力”是从业者对自己的客观评价,也是选择理想职业的必要条件;选择“没有别的选择”选项的人都从事着声望值较低的职业,此选项表明他们只能从事这种职业或者是对自己没有某种能力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表现出的一种无奈。由此,选择这两个理由的人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对职业的预期,笔者认为,他们经过自身努力后可以实现自己的职业期望。由此,我们特别针对选择这两种理由的人员进行分析,并对前文期望择业的结果进行调整。

表 4 选择理想职业的理由

理由 \ 职业	职业									总计
	1	2	3	4	5	6	7	8	9	
收入普遍较高	6	8	19	127	27	36	51	238	2	514
社会地位较高	0	0	0	0	31	12	13	13	2	71
声望较高	1	1	0	0	19	19	8	3	1	52
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6	40	7	80	33	65	31	51	3	316
没有别的选择	12	83	32	28	3	7	4	6	5	180
其他	5	11	6	13	9	20	1	22	1	88
总计	30	143	64	248	122	159	108	333	14	1 221

(三) 调整后的职业期望

改变职业理由为“个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没有别的选择”的人员共 496 人,有 246 人发生了职业流动。其中 187 人向上流动,39 人向下流动(没有包括“其他”项)。这样,在农民现在从事职业的基础上,结合这 246 人选择理想职业的情况,便可得到调整后期望职业选择的结果(见表 5):

表 5 调整后职业选择的结果

期望 \ 现职	期望									总计
	1	2	3	4	5	6	7	8	9	
1	102	6	6	15	5	9	4	3	1	151
2	8	343	17	10	5	15	4	9	2	413
3	0	3	123	11	10	2	2	8	2	161
4	1	7	5	208	2	5	8	16	1	253
5	0	1	0	2	47	2	1	2	0	55
6	0	0	0	4	1	69	4	3	1	82
7	0	0	1	5	0	0	27	3	0	36
8	0	0	0	0	0	0	1	29	0	30
9	0	4	0	2	1	0	4	2	26	39
总计	111	364	152	257	71	102	55	75	33	1 220

经过调整后的结果显示,大部分人都从事原来的职业。由现在职业向未来期望职业的流动非常小。表中的数据表明,尽管农民向其他职业流出的人数最多,但按比例却不是最大的,流出率最高的是雇工,但也仅仅流出了 49 人,占雇工总人数的 32.45%,其中期望流向个体工商劳动者的人数最多,为 15 人(占总人数的 9.93%)。农民期望向农民工和农村智力劳动者转移的人数较多,分别占农民总人数的 4.12%和 3.63%;农民工期望向个体工商劳动者和农村管理者转移的人数较多,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6.83%和 6.21%。个体工商劳动者期望流向私营企业主的人数最多,为 16 人,占个体工商劳动者总人数的 6.32%。流出最少及流入最多的均为私营企业主,30 人中仅有 1 人流出,没有流出的 29 人在职业流动后的 75 人中仅占 38.67%。流入最少的是农民,表明很少有人愿意务农。

四、总结及对策建议

(一) 总结

通过上述农民非农职业流动及期望的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1)在由初职向现职的转变过程中,农民向非农职业的转移率是非常大的。而从现职到理想职业的转变过程中,尽管大多农民都想流出农业,但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仅有 70 位农民可能流向非农职业。这表明我国农民非农化的步伐在变慢。(2)初职到现职的流动多发生在低声望职业之间,农民人数变化最大,但主要集中在文中涉及的前 4 个职业间的流动,而后 4 个职业的流入和流出人数都较少。(3)在期望改变自己职业的人员中,尽管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实现职业期望的人占较大比例,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选择流出,其中流出率最高的是雇工而不是农民。人员流向表现为:雇工、农民、农民工向个体工商劳动者流动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向私营企业主的流动。这表明农民进入非农领域后,其中一小部分经过资本积累将流向高声望的职业,而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低层职业和高层职业的连接点。(4)个体工商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是最受农民青睐的职业,私营企业主也是文中农民可选择的声望最高的职业。但这两个职业在我国整体职业声望排序中,只能排在中下水平,说明我国农民尽管转变了身份,但其总体地位仍然不高。

(二) 对策建议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改变农民身份的政策,在初始实施期成功地使农民从束缚他们的土地上脱离出来并汹涌向低层非农职业当中。然而,从农村走出的农民只是我国农民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继续让农民跳离农门以及让农民流入高层职业。而上述的系列政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作用是微弱的,因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快农民向非农职业流动的进程:

1. 提高农民自身的就业能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向高声望职业的流动需要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然而我国农民的能力和社会资源都非常有限。这就是在初职到现职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流动人数非常多,却大部分集中在低声望的 4 个职业间流动,而在预期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时很少人改变职业的原因。事实上,声望较高的职业是有门槛的:农村管理者需要一定的声望甚至较强的经济实力;农村智力劳动者需要前期的教育投入;乡镇企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雄厚的经济资本。高门槛只能使普通农民将从事这四个职业作为美好的愿望。因此,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全局出发,完善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而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尤其是职业技术培训,让农民具有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2. 拓宽农民非农就业的范围。从调查的结果看,我国农民非农化还表现出就业范围非常狭窄的状况,在“其他”选项中涉及的职业也不过是前8个职业所不包括的工人类别和农村中具有某种手艺和特长的人。因此,我们应该为农民提供更多类型的非农职业,并使其成为农民流向上层社会的途径。比如在现实中,管理农村的都是非农民身份的人,让有能力的农民进入到政府(乡、镇)管理自己,这在新农村建设中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

3. 关注其他非农职业就业农民。近年,农民工问题更多地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出现,所引起的强大呼声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事实上,农民工问题和其他非农职业人员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是不分轻重的。如文中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劳动者大多由农民工转变而成,增加对他们的关注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和雇工的流入。但这两个职业的风险较大,事业的失败会使他们回流到农民的行列中,现实情况是国家在社会保障、信息供给等方面对他们的关注极少。另外,农村管理者 and 农村智力劳动者在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但我们对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等的关注也是不够的。

外出打工开阔了农民的眼界,进而使之形成了根据自己的能力向上层流动的愿望,但能够实现向上流动的人员毕竟是少数。农民离开农村后逐渐流入到高声望职业的过程是漫长的,最终的结果可能在这一代人身上观察不到了,这需要从代际流动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的变化。值得欣慰的是,在农民选择自己未来职业时,个体工商劳动者显现出成为“缓冲职业”的趋势。这个中间层的出现在我国阶层分化尤其是我国农民分化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路径逐渐短化的职业流动过程中,它将成为农民向高层流动的驿站。

[参 考 文 献]

- [1] 邹农俭. 论农民的非农化[J]. 社会科学战线, 2002, (1): 1 - 7. [Zou Nongjian. The Non-farm of Farmer[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02, (1): 1 - 7.]
- [2] 张佑林.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探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4, (12): 69 - 71. [Zhang Youlin. The Analysis of the Migration of Rural Surplus Labor in the Structure of Dual Economy[J].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4, (12): 69 - 71.]
- [3] Knight, J., Song Lina. Chinese Peasant Choices: Migration, Rural Industry or Farming [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3, 31(2): 123 - 147.
- [4] Zhao Yaohui.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281 - 286.
- [5] 蔡 都阳, 王美艳. 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Cai Fang, Du Yang, Wang Meiyang.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Labor Migr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6] 钱永坤. 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行为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5): 62 - 70. [Qian Yongkun. A Study on the Behavior of Rural Labor's Migrat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6, (5): 62 - 70.]
- [7] 程名望, 史清华, 刘晓峰.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从推到拉的嬗变[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5(6): 105 - 112. [Cheng Mingwang, Shi Qinghua, Liu Xiaofeng.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Push to Pull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5, 35(6): 105 - 112.]
- [8] 李春玲. 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Li Chunling. Cleavage and Frag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2005.]
- [9] 李强.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 1999, (3): 93 - 101. [Li Qiang. Occupation Shift of Farmer Workers in Mainland China [J]. Sociological Studies, 1999, (3): 93 - 101.]